

張 瀛著

# 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

## 前言

這本小書是我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危機意識〕一書英文本的副產品。在那本書裏，我討論了譚嗣同的思想，可是由於主題和篇幅的限制，未能對譚嗣同的思想作一全面的分析，因此有這本小書的嘗試。

此書問世之時，正值外婆逝世三十週年紀念。謹以此書獻給她老人家在天之靈。

張灝

1987年初夏

# 目次

前言.....	i
一、序論.....	1
二、性格、身世與環境.....	9
三、心路歷程之一——宗教心靈的湧現.....	33
四、心路歷程之二——影響和變化.....	57
五、心路歷程之三——由保守到激進.....	69
六、譚嗣同的仁學.....	87
七、結論.....	131
參考書目.....	143
索引.....	151

# 一、序論



譚嗣同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能算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但却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他的一生總共只有三十六年，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也不過三、四年時間，然而在這短短的時間裏，他却留下了光彩的事跡、感人的身世、和深遠的影響。這一本小書，不是譚嗣同的傳記，而是希望透過他的一生行跡和他的作品，鈎畫出他的主要思想發展，他的「心路歷程」。

譚嗣同的心路歷程，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因此，透過他的心路歷程，我們也多多少少可以看見一些近代思潮演變的痕跡。

稱之為「心路歷程」，不是隨便的譬喻，因為我在這裏所謂的思想，不僅是指觀念層次上的意識，同時也是指情感層次上的意識；它包括內心生活的各面，只有綜合內心生活的各面，我們才能看到譚嗣同的精神全貌，他的心靈世界。

大約而言，思想史有兩種，一種是觀念發展式的思想（history of ideas）。這種思想史的着眼點是觀念的歷史發展，它的主要目的是看觀念如何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從而分析這些觀念間的衍生與邏輯關係，探討這些觀念與其他觀念之間所產生的緊張性和激盪性。西方史家魯佛

覺(Arthur Lovejoy)的〔存在的鏈鎖〕(*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和萊根(Anders Nygren)論「愛」這一觀念在西方傳統裏的演變(*Agape and Eros*)都是這一類思想史的典範之作<sup>1</sup>。這種思想史用來處理哲學史或思想史上的重要觀念有其特殊的價值，但是作者在這本書裏不擬採取這種方法，因為譚嗣同不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本身，抽離地或者孤立地去看，沒有什麼重要的價值。因此，我所採取的是另一種治思想史的途徑，那就是把他的思想放在他的時代脈絡裏去看，看他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如何在思想上作自覺的反應。只有這樣來處理，譚嗣同的思想的歷史意義才能彰顯。

譚嗣同生長的時代是十九世紀的最後四十年，他的思想由成熟到發揮影響的時期也正是中國文化在近代進入一個轉型的時代(1895—1911)<sup>2</sup>。在這轉型過程中，譚嗣同的

<sup>1</sup>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Anders Nygren, *Agape and Eros*, (Harper and Row, 1969).

<sup>2</sup>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Hao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2, *Late Ching: 1800-1911*, pt. 2, 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74-338.

思想扮演了一個極重要的角色。然而由於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要替他在當時的思想界做一個定位並非易事。首先，當時思想界的重大論爭，他幾乎都未曾直接參與。當時辯論激烈的今古文之爭，譚嗣同並未真正捲入。梁啟超與康有為本人都強調譚嗣同受康有為之今文學的影響<sup>3</sup>。事實上，康梁的這種強調都嫌誇大。譚嗣同受康有為之影響甚晚，直至死前的兩三年他才與康有為的思想有所接觸，而其時他的思想的基本形態已大致形成。故當時康有為的今文學雖然在譚嗣同的思想裏留下一些痕跡，這些痕跡卻與他的基本思想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此外，清季的另一思想論戰——革命與改革之爭，譚嗣同也未介入<sup>4</sup>。這固然是由於這個論戰主要

<sup>3</sup> 見梁啟超「仁學序」及「譚嗣同傳」，收於〔譚嗣同全集〕（三聯書店，1954版），關於康有為自認對譚之影響，見康著「六哀詩」，此詩也收入〔譚嗣同全集〕（p.527.）

<sup>4</sup> 關於此論爭，見元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臺北，1964）；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1964）；英文有關著作，參見 Mary B.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Mass, 1971) 及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 (Seattle, 1969)；日文方面有關著作，參閱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京都，1960）第七章：「章炳麟排滿思想」，頁398-480。

爆發在譚嗣同戊戌死難之後，但更重要的是，他晚年雖參加康梁變法，他的思想實兼有當時所了解的革命與改革兩種成分，假若他未死於戊戌之難，他後來的思想演變究竟屬於改革型還是革命型，實在很難說。

以當時思想界的重大論爭去給譚嗣同「定位」固然不易，以今天史學家對中國近代思想的一些流行的觀念去瞭解他的心態也頗有隔靴搔癢之虞。「民族主義」這個常用的觀念就是一個例子。不錯，民族主義之變為近代中國的一個主要思潮，是始於清季轉型時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譚嗣同思想雖含有一些國家觀念與種族意識，這些觀念和意識對他的中心思想却影響不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裏稱譚嗣同思想為「世界主義」，實在是有所見而發的<sup>5</sup>。

除「民族主義」之外，中外學者有時以「現代化」這個觀念去分析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趨勢，但所謂「現代化」是現代學者所用之範疇，是否可以適用於清季知識分子的思想也很成問題。大致而言，「現代化」這一觀念有廣狹二義：就其狹義而言，「現代化」與一般所謂的「經濟發展」不分。就其廣義而言，則指社會學家以韋伯（Max Weber）的「功效理性」為基礎而建立的「理性化」這一發展過程。重要的是，不論是狹義或廣義，「現代化」都不是以「道德取向」為主的概念，而譚嗣同的思想却含有極濃厚的道德色彩，因此，在詮釋譚嗣同的思想時，我們很難乞助於「現代

<sup>5</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1963）。

化」這一範疇<sup>6</sup>。

此外，已故美國學者李文孫（Joseph Levenson）在其所著〔中國儒家文化與其命運〕一書中，曾特別強調「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這一觀念，並以此去分析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心態<sup>7</sup>。李文孫此處所謂之「文化認同」乃指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的衝擊與震盪之下，由挫折感與屈辱感所產生的文化自卑心理。李文孫認為，由於這種自卑感的作祟，中國知識分子，自晚清以來，往往有美化傳統的心理需要<sup>8</sup>。從這個觀點去看，譚嗣同早年思想容或含有這種心理因素。但其晚年成熟之思想則難以用此種心理解釋去概括。由上面的分析可見：現代史家所習用的一些觀點與範疇，我們都不能藉以窺譚嗣同思想的全豹。

因此，今天我們要瞭解譚嗣同之思想特色，必須跳出既有的一些觀點的窠臼。我們必須認識，譚嗣同一生，因為與

<sup>6</sup> 關於「現代化」這一觀念的討論，西方論著甚多，其於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適用性，可參見：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8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2-3.; Benjamin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as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Daedalus*, Spring, 1972. pp. 71-88.

<sup>7</sup>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1958), "Introduction", pp. xiii-xix.

<sup>8</sup> 同前注

趣和活動極為廣泛，思想難免相當駁雜，但是我們若仔細分析他一生的著作和行跡，亦不難發現他的思想有其脈絡可尋，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透露一種特殊的心態，這種心態充分反映在他一生中最有影響的兩件大事：戊戌死難時他所表現的烈士精神和他在死難前兩年所寫的一本書——〔仁學〕，要瞭解這種心態和產生這種心態的思想背景，我們必須先對他個人的性格、身世和環境作一番分析。

## 二、性格、身世與環境



譚嗣同從小就展現出他的性格中最大特色：豐富的情感與豪邁的氣質。這種「浪漫型」的性格，在他早年生命的兩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第一是他的詩詞。譚嗣同從少年時就開始寫詩詞，許多作品極富感性，表現出一種獨特的風格與才華。例如他在十五歲時為送別他的仲兄赴甘肅省父，寫了一首七絕：

一曲陽關意外聲，青楓浦口送兄行。頻將雙淚渙邊洒，流到長江載遠征。

碧山深處小橋東，兄自西馳我未同。羨煞洞庭連漢水，布帆斜掛落花風。

蕭蕭連夜雨聲多，一曲驪駒喚奈何。我願將身化明月，照君車馬度關河。

鷗鵝聲裏路迢迢，匹馬春風過灞橋。灞上垂楊牽客思，也應回首故鄉遙。

春烟澹澹暗離愁，雨後山光冷似秋。楚樹邊雲四千里，夢魂飛不到秦州<sup>1</sup>。

譚嗣同的感情不但發為濃厚的手足之愛，而且也時而表

<sup>1</sup> 見〔譚嗣同全集〕，頁487。

現為強烈的社會同情心和正義感。他在旅行時，偶爾見到一些悲慘的或者不平的事件，便會觸發他的情感，反映在他的詩篇裏。例如，他在二十四歲出外旅行時，曾寫下「兒纜船並敍」這樣一篇詩章：

友人泛舟衡陽，遇風，舟瀕覆，船上兒甫十齡，曳舟入港，風引舟退，連曳兒仆，兒喚號不釋繩，卒曳入港，兒兩掌骨見焉。北風蓬蓬，大浪雷吼，小兒曳繩逆風走，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兒手。繩倒曳兒兒屢仆，持繩愈力繩靡肉，兒肉附繩去，兒掌惟見骨。掌見骨，兒莫哭，兒掌有白骨，江心無白骨。

同年，他又寫了下列兩首小詩：

### 「瞿粟米囊謠」

瞿無粟，囊無米，室如縣磬飢欲死，飢欲死，且莫理，米囊可療飢，瞿粟裁千里，非米非粟，蒼生病矣。

### 「六盤山轉讓謠」

馬足蹩，車軸折，人蹉跌，山岌岌，朔雁一聲天雨雪。與夫與夫，爾勿嗔官！僅用爾力，爾胡不肯竭？爾不思車中累累物，東南萬戶之膏血，嗚呼車中累累物，東南萬戶之膏血<sup>2</sup>！

短短的幾行，淡淡的幾句，這些小詩却道盡了他對社會

<sup>2</sup> [譚嗣同全集]，上引三首小詩各見頁461, 462, 463。

## 大眾的關懷和同情！

至於他性格中豪邁超逸的一面，譚嗣同在他十八歲時，爲自題小照所寫的一首「望海潮」詞裏，曾有清楚的流露：

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骨相空談，  
腸輪自轉，回頭十八年過；春夢醒來波：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哦；惟有瓶花數枝，相伴不須多；寒江纔脫漁蓑；剩風塵面貌，自看如何；鑑不因人，形還向影，豈緣酒後顏酡；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sup>3</sup>。

「詩如其人」這句話，就譚嗣同而言，是再恰當不過了，譚嗣同在這首詞中自稱「有幾根俠骨」，而他的一生行跡也確實常常顯出俠氣縱橫。這是他生命中的另一突出面，據梁啟超說，譚嗣同年輕時「好任俠，善劍術」，當他父親在甘肅服官時，他常常出入西北邊塞，騎馬射箭，奔逐馳騁<sup>4</sup>。這種任俠的傾向，正如同他豐富的感情，是他性格中與生俱來的，對於他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響。

要瞭解譚嗣同的思想，他的主觀性格和稟賦固然重要，客觀環境也同樣不容忽視。與許多人一樣，譚嗣同的思想大部分來自他對所處環境所作的回應。所謂環境是指三個因素。首先是他的社會背景，特別是他的家世。這個因素對他

<sup>3</sup> 〔譚嗣同全集〕，頁277。

<sup>4</sup> 〔譚嗣同全集〕，「劉雲田傳」，頁170-172；「致劉湛美書」，頁376；「與沈小沂書」，頁431。

的影響至少有三方面。他出身仕宦之家，因此受到極良好的傳統教育。父親的游宦，加上他本人南北奔走應試，使他有許多旅行遊覽的機會。譚嗣同在「三十自紀」一文中，對自己的旅行之廣，特別引以爲傲，他曾計算他的旅行「合數都八萬餘里，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周」<sup>5</sup>。這些旅行自然增廣了他的交遊與見識，開闊了他的眼界，例如他在二十六歲時，曾隨他的父親赴湖北巡撫任所——武昌。武昌也是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駐節所在，張的幕府中人才濟濟，如汪康年、繆荃蓀、徐建寅與黃紹箕等，都是當時有學問、有新思想的士大夫。譚嗣同在武昌有機會與他們結識來往，對他的眼界和學識自然極有增益<sup>6</sup>。

譚嗣同的家世不但給他一個良好的學識環境，也給他帶來很多問題和困擾，對他的精神產生相當的刺激。他的父親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官僚，有妻有妾。譚嗣同是嫡出，但母親死得很早，在家裏很受庶母的歧視，和父親的感情也有隔閡。譚嗣同後來在其〔仁學〕「自敍」裏曾提及他的家庭：「吾少至壯，徧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瀕死累矣。」<sup>7</sup> 可見家庭給他帶來的痛苦。

要瞭解環境如何影響了譚嗣同的思想，我們不能只注意他的家世背景，我們也得注意他一生中的各種處境，所謂「

<sup>5</sup> 〔譚嗣同全集〕，「三十自紀」，頁205-206。

<sup>6</sup> 楊廷福，〔譚嗣同年譜〕（北京，1957），頁57-58。

<sup>7</sup> 〔譚嗣同全集〕，〔仁學〕，「自敍」，頁3。